

同中有異的社會科學中國化 ——蔣廷黻與蕭公權之對比

馮先祥

摘要

1931-1937年間，蔣廷黻與蕭公權輪流擔任英文季刊《中國社會及政治學報》（*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的執行編輯（Managing Editor）。兩人對這份編輯工作有截然不同之態度。蔣氏積極刊登新出版史料之介紹書評，撰寫短篇研究心得，並協助費正清發表費氏的第一篇論文。其目的是向海外推廣以中國史料為基礎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同時促進此一領域的中國化與國際化。另一方面，蕭氏獻身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終極關懷是回應「全盤西化」之主張。他缺乏如蔣氏那般向海外推廣自己研究領域之動機，在執行編輯的位置上略顯保守，自我設限於被動消極的編輯工作。蔣氏積極與蕭氏消極之反差，說明兩人在20世紀30年代社會科學中國化的道路上有著以往不易察覺的分歧。他們的歷史經驗或許可給予今日社會科學中國化的推動者有所啟發。

關鍵字：蔣廷黻、蕭公權、《中國社會及政治學報》、社會科學中國化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Sinicization of Social Science(s): A Contrast between Jiang Ting-fu and Xiao Gong-quan

John Hsien-Hsiang Feng^{*}

Abstract

Between 1931 and 1937, Jiang Tingfu (Ting-fu Fuller Tsiang) and Xiao Gongquan (Kung-chuan Hsiao) took turn to assume the Managing Editor of the English quarterly,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Each of them had quite a different attitude towards its editorship. Jiang actively published book reviews of newly released historiographies by Chinese authors, in addition to writing short research articles as well as helping John K. Fairbank publish his first paper. His intention was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ly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on the basis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ies; he would like very much to simulteneously stimulate both the Sinic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is field.

In contrast, Xiao's ultimate concern was to dedicate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and writing of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though he found himself having had to respond to and to further refute the assertion of "wholesale Westernization" (*Quanpan xihua*) current at the time. He seemed to have lacked the sort of motivation that spurred Jiang to promote his own field overseas. He appeared passive in the position of the Managing Editor and chosed to confine himself to the editorship in a conservative sense. The contrast between Jiang's activism and Xiao's passivism shows respectively the perceptible differences in the road chosen for the Sinicization of social science(s) in 1930s. To a certain extent, their historical experiences should offer some lessons and inspire contemporary promoters of the Sinicization of social sciences.

Keywords: Jiang Ting-fu (Ting-fu Fuller Tsiang), Xiao Gong-quan (Kung-chuan Hsiao),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Sinicization of social science

^{*} Ph.D., Faculty of Asian and Middle Easter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同中有異的社會科學中國化 ——蔣廷黻與蕭公權之對比*

馮先祥**

壹、前言

抗戰爆發之前的華北學術圈內，蔣廷黻與蕭公權是從南開到清華的知交，又是各自研究領域的拓荒者。前者致力於中國近代（外交）史的挖掘，後者投身中國政治思想史的領域建構。兩人的生平與學術成就眾所周知，無須贅言。有關兩人的友誼，在《蔣廷黻回憶錄》中沒有特別著墨，但蕭氏的《問學諫往錄》則有段記載：

〔張〕奚若對我最初似乎有點疑忌。他在教室裡對學生講，中國沒有值得研究的政治思想。言外之意，當然是任何人講授中國政治思想史，無異於捕風捉影，大言欺人。我聽他的「高論」，只好付之一笑。廷黻為我抱不平，在《獨立評論》發表的一篇論文裡譏笑留學生回國大談洛克、盧梭，對於中國文化和歷史却不能置一詞。¹

* 本文根據筆者於2014年3月18日在國史館的專題演講「同中有異：一九三零年代蔣廷黻與蕭公權的社會科學中國化之對比」修改而成。特別感謝呂芳上館長、侯坤宏處長、歐素瑛纂修，以及沈大川在報告會場不吝惜批評指教，也感謝張遠及陳昶安在筆者寫作期間提供評論意見。最後，對於匿名審查人的建設性評論，筆者獲益良多，在此一併致謝。

收稿日期：2014年3月30日；通過刊登日期：2014年6月17日。

** 英國劍橋大學亞洲及中東學系博士

¹ 蕭公權，《問學諫往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2年），頁103。

這篇「抱不平」的文章應是〈中國社會科學的前途〉。² 張奚若身為清華大學政治系的西洋政治思想史專家，對同僚蕭公權的公開質疑，意味著對中國政治思想史學術價值之根本否定。這樁政治系同仁之間的輕視與嘲諷，被同校歷史系的蔣廷黻上綱至當時中國整個社會科學發展的結構性困境。他批判：

……中國現在還有許多人不知道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以及牠〔它〕們的歷史是值得研究的，必須研究的，而且可以研究的。……他們看見英美各國的大學有些什麼社會科學的課程，也就照樣設立這些課程。論課程的多寡，那我們貴國的大學很像堂堂「最高學府」的樣子。……在我們貴國的大學學市政的或者知道紐約、巴黎的市政，但北平、漢口、成都的市政十之八九是不知道的。……學政治思想的，那一定上自柏拉圖，下至拉斯基，都聽過一遍，好一點的，還對於某派某家下過專門的研究。……我們的大學不是在這裏為中國造人才，反在這裏為英美法造人才。³

王汎森認為，「五四以後中國形成了一個『新學術運動』」，⁴ 中國知識階層逐漸理解西方富強的根基是思想與知識，並承認自己的國家在這方面是落後的。傳統學問已無法應付新時代的諸多問題，因而遭到激烈的批判。五四運動意味著知識階層針對已流傳約二十年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主張進行一場大規模的總檢討。隨著同情五四的知識階層在學術界的影響力逐漸增長，大學校園成為他們「學術救國」的根據地。這股「新學術運動」的領袖，例如胡適、蔡元培等，一方面重視大學不受政治干擾、追求知識、傳播知識的理念價值。⁵ 另一方面，「賽先生」——五四運動的兩大口號之一，催化了知識階層對於科學的崇

² 蔣廷黻，〈中國社會科學的前途〉，原發表於《獨立評論》，第29號（1932年12月4日），收入《蔣廷黻選集》，第1集（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年），頁153-158。

³ 蔣廷黻，〈中國社會科學的前途〉，頁154。

⁴ 王汎森，〈總論〉，收入王汎森等，《中華民國發展史——學術發展》，上冊（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1年），頁7-11。

⁵ 例如，有關北京大學在五四之後的學術發展及其影響，Timothy Weston, *The Power of Position: Beijing University, Intellectuals, and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1898-192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以及Xiaoqing Diana Lin, *Peking University: Chinese Scholarship and Intellectuals, 1898-1937*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5)。

拜。⁶ 這股驅動力量促使知識階層將「賽先生」帶入諸多研究領域之中。

蔣廷黻這篇〈中國社會科學的前途〉可說是針對這股「新學術運動」的批判性反思。由於學科性質不同，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領域裡對於「賽先生」的追求不能一概而論。蔣氏認為，「在自然科學方面，中國雖然沒有什麼成就，但世界各國在物理、數學、生物、化學等方面的成就，中國都可以抄襲使用。可是在人文學和社會科學方面，我們所遭遇的問題就和其它國家不一樣了。」⁷ 換句話說，他認為自然科學也許放諸四海而皆準，但由於地域和文化的差異，西方的社會科學不適合拿來解釋中國的問題。中國的社會科學必須為中國的問題提供解釋。在20世紀30年代，已有相當多的留學生返國服務。雖然來自日本的威脅與日俱增，但北伐成功使中國獲得短暫的和平，這可說是有利於學術發展的環境因素。不幸的是，學成歸國的社會科學家，由於教書負擔太重或其他原因，不是十分願意投入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及歷史等領域，建立系統性的理論解釋。在大學校園內，他們把歐美大學的課程照樣搬來，引介、複製留學時所學的西方理論，對於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及歷史等領域缺乏實質貢獻。這使得社會科學在中國只是西方學界的延伸，缺乏主體性。蔣氏對此甚為不滿。他透過這篇文章一邊為蕭公權緩頰，一邊呼籲同時代的學人研究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及歷史，使中國的社會科學能為中國建立系統性的理論解釋，為中國自身的問題提供看法。

蔣廷黻的「抱不平」也意味著他肯定蕭公權學術努力的方向，暗示自己和蕭氏都致力於有關中國的系統性知識的累積。或許史學屬不屬於社會科學仍有歧異；但是，民國時期有不少歷史學家，包括蔣氏自己，受實證主義影響，注重客觀的歷史解釋，在中國推動歷史學的科學化。以某種程度來說，歷史學可看作是社會科學的分支，蔣氏的〈中國社會科學的前途〉也將歷史學與政治學、社會學及經濟學相提並論。⁸ 依照他的觀點，歷史學屬於社會科學，他和蕭氏都是社會

⁶ 有關近代中國的科學崇拜，參見郭穎頤著，雷頤譯，《中國現代思想中的唯科學主義（1900-1950）》（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

⁷ 蔣廷黻英文口述，謝鍾建譯，《蔣廷黻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4年再版），頁123。

⁸ 蔣廷黻，〈中國社會科學的前途〉，頁158。

科學家，他的中國近代史和蕭氏的中國政治思想史同屬於中國社會科學之範疇。另一方面，如果我們接受一個粗略的界定：對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及歷史等領域追求系統性的解釋是廣義的社會科學中國化，那麼我們可將蔣、蕭兩人看作20世紀30年代社會科學中國化的推動者，進而對今日社會科學的中國化提供一個歷史性的觀點。

有趣的是，在民國研究大行其道的近二、三十年間，兩人的學術成就已經有不少的個別討論，但兩人之間的對比卻付之闕如。⁹ 1931-1937年間，蔣、蕭兩人輪流擔任《中國社會及政治學報》（*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以下簡稱《學報》）的執行編輯（Managing Editor）（表1）。這是當時頗有聲望的學術性英文季刊，¹⁰ 這段期間內，蔣氏在《學報》上發表1篇論文、6篇短篇研究心得，以及14篇書評，討論範圍涵蓋中國當時及過去的對外關係。他持續利用這份英文季刊向國際（主要是英語世界）分享、推廣以中國方面之史料為基礎的中國近代史研究。相較之下，蕭氏嚴守本分，力求執行編輯份內之工作盡善盡美，蕭氏在《學報》所發表的僅有書評5篇，聊勝於無，落差格外明顯。兩人對這份英文季刊的態度形成十分鮮明的對比。本文透過《學報》呈現蔣氏之主動積極和蕭氏的被動消極，討論他們對自身研究領域中國化之不同取向。他們的歷史經驗或可提供當代社會科學中國化的推動者有所借鏡。

⁹ 有關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之討論，例如蔡樂蘇、伊媛萍，〈蔣廷黻史學理念釋要〉，收入桑兵、趙立彬主編，《轉型中的近代中國——近代中國的知識與制度轉型學術研討會論文選》，上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頁425-443；林志宏，〈蔣廷黻、羅家倫、郭廷以：建立「科學的中國近代史」及其詮釋〉，《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雜誌》，第42卷第4期（2004年12月），頁41-81；歐陽軍喜，〈蔣廷黻與中國近代史研究二題〉，《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期（2001年），頁88-94；沈渭濱，〈蔣廷黻與中國近代史研究〉，《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第4期（1999年），頁72-79；林文仁，〈介於兩個世界之間——蔣廷黻和他的中國外交史研究〉，《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第31期（1999年6月），頁117-160。有關蕭公權的中國政治思想史之討論，例如孫宏云，〈蕭公權與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基於蕭著《中國政治思想史》的分析〉，收入桑兵、趙立彬主編，《轉型中的近代中國——近代中國的知識與制度轉型學術研討會論文選》，上卷，頁177-191；汪榮祖、黃俊傑編，《蕭公權學記》（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9年）；張允起，《憲政、理性與歷史：蕭公權的學術與思想》（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

¹⁰ 蕭公權，《問學諫往錄》，頁103。

表1、1931-1937年間《學報》執行編輯列表

	卷號	發行年月
蔣廷黻	第15卷第1-4期 第16卷第1-4期 第17卷第1-4期 第18卷第1-2期	1931年4月至1934年7月
蕭公權	第18卷第3-4期 第18卷第1-2期	1934年10月至1935年7月
蔣廷黻	第19卷第3-4期	1935年10月至1936年1月
蕭公權	第20卷第1-4期 第21卷第1期	1936年4月至1937年4月
蕭 遽	第21卷第2期	1937年7月

資料來源：根據《學報》自行整理而成。

貳、《學報》及其發行單位

《學報》由座落紫禁城東南角的中國社會及政治學會（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於1916-1941年間發行。第一年曾以《政治學報年刊》（以下簡稱《年刊》）的名稱，將第一卷全4期另外發行中文合訂本。這也是目前所知唯一的中譯版。編輯與發行的學會是由外交總長陸徵祥、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Paul S. Reinsch），以及一群肯定西方科學優越性的中外人士在1915年12月共同成立。他們認為，在中國，「主宰著中國的精神生活的舊的文學知識已經大都不能滿足人們的需要，而西方的科學知識的作用尚未強大……」，有必要在中國建立一個中心，「把舊文化與新文化協調地、有機地結合起來」，集中知識界的力量，在政治、社會、經濟等領域產生推波助瀾的功效。¹¹

¹¹ 芮恩施著，李抱宏、盛震溯譯，《一個美國外交官使華記：1913-1919美國駐華公使回憶錄》（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頁121-122。譯注錯誤地認為該學會成立於1917年。

在成立大會上，當選首任會長的陸徵祥致辭指出，「此種學會，實中國海通以來所未曾有。……斯會者，將以綰聯中外人士智識上之關係，揭橥中華古國新世紀之肇端。職志所在，企望斯深。」¹² 自戊戌時期以降，各種討論西學的學會如雨後春筍般冒出。有的企圖廣泛涉獵來自西方的各種學問，例如南學會；有的致力於單一西學領域的討論，例如公法學會。然而，從晚清到民國，似乎沒有一個學會是由中外人士共同創立的。「實中國海通以來所未曾有」的陳述指出這個新成立的學會和其他同類團體最大的區別在於外國人士的參與，進而追求「中外人士智識上之關係」。另一位在成立大會中致辭的第一副會長當選人芮恩施，則詳細闡述了陸氏為這個新學會設立的目標。《年刊》譯：

竊謂斯會之成立，其所以扶翼舊邦于文明昌運者，塗術有二。華夏舊猷，歐美新學，合爐而治，取精用宏，一也。今昔國是民情，絕域殊俗之人，容或見聞未審識時之俊，藉茲愷切摠陳，疏通情蘊，以喻天下，益篤邦交，二也。繼自今，斯邦人士之談國計民生，欲其觀察紀述剖論之能嚴密精確而求有可為之圭臬者，舍斯會其誰屬。¹³

從譯文推斷，該會以協助中國知識界揉合中西文化為目的，同時增進外國人士對於中國之認識。

然而，如果對照《學報》刊登的原文，可以發現《年刊》將芮恩施的致辭做了創造性的翻譯，隱藏中國社會及政治學會設立背後的文化預設立場。芮氏指出：

本學會之成立，依我所見，構成中國的科學與智識生活發展之重要的一步。這意味著中國的思維同國外的科學活動，即歐洲與美國兩地，一個更緊密的鏈接與聯繫。這許諾了世界的普遍智識一個契機，以客觀且可靠的形式，一致且持續地解釋中國過去與現在的政社經驗。這也代表著，對政治社會行動感興趣的人士之間，觀察、記錄及分析方法在中國的標準化，藉這些方法進而產生科學精確性的嚴謹規範。

¹² 嚴鶴齡，〈政治學報並政治學會之緣起〉，《政治學報年刊》，第一年週刊（1916年），頁12。嚴氏是這份英文季刊的第一任執行編輯（1916-1919年）。

¹³ 芮恩施著，郭雲觀譯，〈中華政治學會敘言〉，《年刊》，頁2。

The founding of this Association, to my mind,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step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cientific and intellectual life of China: it means a closer linking up and affiliation of Chinese thought with scientific activities abroad, both in Europe and in America; it promises an opportunity for a consistent and continuous interpretation, in objective and reliable form, of Chinese political and social experience in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to the general intelligence of the world. It also stands for the standardizing of methods of observation, recording and analysis in China, among the men interested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action, bringing to bear upon these methods the rigid criteria of scientific exactness.¹⁴

「益篤邦交」可說是《學報》為美國駐華公使額外添加的中美外交辭令。更重要的是，致辭原文反覆強調科學，但「合爐而治，取精用宏」的翻譯頗容易讓人誤解該會對於中國舊學與西方新學的態度是不偏不倚的。事實上，不論「治」、「取」和「用」，該會皆欲以科學為準繩，用標準化的科學研究方法檢視中國現在與過去的政社經驗，追求符合科學規範的系統性解釋，進而與歐美的知識界接軌。簡單來說，「綰聯中外人士智識上之關係」乃以科學為基礎。該會的預設立場是新學優於舊學，必須以新學改造舊學，而「扶翼舊邦于文明昌運」的工具是科學。

中國社會及政治學會早在五四運動之前已經成立，其宗旨與「賽先生」或「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等口號不謀而合，但不如「打倒孔家店」或「全盤西化」那般激進。五四的領導人之一胡適最早於1919年便開始在《學報》上發表論文，又於1933-1937年間擔任3屆會長。¹⁵ 另一位領導人蔡元培曾在1917年底受邀前往該學會發表演說。¹⁶ 然而，筆者目前並沒有見到相關史料能說明該會對五四

¹⁴ Reinsch, "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以下簡稱*Review*), 1:1 (April 1916), pp. 13-14.

¹⁵ Hu Suh (Hu Shih), "Intellectual China in 1919," *Review*, 5:4 (December 1919), pp. 345-355; "The Chinese Social &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Officers [D 5 1916 – JA 31 1937]," in C. D. Henry Ch'en ed., *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Index to Volumes I-XXIV, April, 1916-March, 1941* (又名《中國社會及政治學報第一至第二十四卷總引得》) (Hong Kong: Lung Men Bookstore, 1967), p. 74.

¹⁶ "Notes and Reports," *Review*, 2:4 (December 1917), p. 2.

運動有什麼樣的直接影響。可以確定的是，該會追求「賽先生」之時，也欲建立「中外人士智識上之關係」，其對象包括中國人及外國人士。五四運動欲啓蒙與復興的對象則是中國人，兩者的對象並不一致。學會成立之目的決定了《學報》的定位。「本報發起者，原欲徵刊外國人士之投稿，日期推行於國外，則當用英文，更無容疑。」¹⁷ 這份提倡中外人士共同採用科學方法重新解釋中國政治、社會、經濟及歷史等領域的英文季刊於焉誕生。

叁、蔣廷黻與中國化也國際化的中國近代史

中國近代史是蔣廷黻在清華時期發現的「新大陸」。¹⁸ 「新」在於他使用了過去不曾被注意的中國方面的史料。在清華做研究擁有臨近清代帝都的地利優勢。蔣氏說：「我乘便可以接觸故宮博物院的檔案。有一段時間，我們有好些人在故宮博物院抄錄檔案，把未公佈的重要文件抄錄下來。」¹⁹ 在這樣的檔案研究基礎上，蔣氏於20世紀30年代陸續發表包括〈琦善與鴉片戰爭〉等多篇論文。

「歷史研究的結果修正了固有的觀念。清末一百年間處理中國（對外）事務的領導人，不論滿漢，並非像過去出版物所渲染的全是壞得不可救藥的。……中國與列強之間的早期談判大部分是錯誤的鬧劇……。」²⁰ 當代論者對於蔣氏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之看法雖然存在些許的差異，但大致上來說，他們普遍認為蔣氏受當時歐美實證史學的風氣影響，重視史料，尋求客觀史實的嚴謹治學精神。他以這樣的精神在中國開墾了一片新的知識領域——中國近代史，讓國人於晚清的對外關係有更深一層的認識。就系統性知識累積的角度看，這不能不說是他對於社會科學中國化的努力。

¹⁷ 嚴鶴齡，〈政治學報並政治學會之緣起〉，《年刊》，頁14。

¹⁸ 蔣廷黻英文口述，謝鍾璉譯，《蔣廷黻回憶錄》，頁129。

¹⁹ 蔣廷黻英文口述，謝鍾璉譯，《蔣廷黻回憶錄》，頁127。

²⁰ 蔣廷黻英文口述，謝鍾璉譯，《蔣廷黻回憶錄》，頁129。

一、推動中國近代史的國際化內在驅動力

除了修正國人對中國近代史的誤解，蔣氏獻身此領域的另一動機是回應馬士（Hosea Ballou Morse）的《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就英、美兩方的資料說，莫斯〔即馬士〕的書是無懈可擊的。但，事實上，僅憑兩國資料是寫不出傑出的外交著作的。因此，莫斯的著作觀點是片面的。」²¹ 蔣氏又說：

外交史與別種歷史不同之點，就是牠〔它〕的國際性質。撰外交史者必須搜羅有關各國的文件。根據一方面的文件來撰外交史，等於專聽一面之詞來判訟。²²

他的立場表達得很清楚。外交是多個國家之間的互動。外交史的著作須參照各國的檔案，追求更全面的解釋。馬士討論中國近代的外交關係，卻獨漏中國方面的史料，他的論述因而被蔣氏指為「片面的」。事實上，馬士自己也承認「沒有中國的官方檔案或其他權威性的資料來從中國方面說明問題」。²³ 蔣氏致力鑽研中國方面的史料，從馬士遺留的空白處出發，與之對話，重新看待晚清的對外關係。就這點看，他對於中國近代史的投入是為了回應與補充馬士的不足之處。

弔詭的是，當蔣廷黻主張外交史研究必須兼顧各國史料之時，他似乎沒有打算在自己的中國近代史研究裡使用其他國家的檔案。他自我設限地說：「我想根據中國書面資料，來研究中國外交史。」²⁴ 這似乎有自我矛盾之嫌。站在替蔣氏辯護的立場，我們也許可以主張馬士偏重英美方面的史料，而蔣氏運用馬士沒有使用過的史料。這正是蔣氏的研究之學術價值所在，我們不能說他的研究沒有針

²¹ 蔣廷黻英文口述，謝鍾璉譯，《蔣廷黻回憶錄》，頁95。蔣氏將Morse譯作莫斯，*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則譯作《中國國際關係》。為避免混淆，本文採用今日常見的譯名，馬士和《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參見馬士（H. B. Morse）著，張匯文等譯，《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全3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年）。

²² 蔣廷黻，〈外交史及外交史料〉，原發表於《大公報》，天津，1932年10月10日，收入蔣廷黻，《中國近代史研究》（臺北：里仁書局，1982年），頁66。

²³ 馬士著，張匯文等譯，《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1卷（一八三四—一八六〇年衝突時期），頁3。

²⁴ 蔣廷黻英文口述，謝鍾璉譯，《蔣廷黻回憶錄》，頁95。

對馬士的論述做出回應與補充。他又說：

甲午以前，我們當特別注重中國方面的資料。因為中日戰爭以前，外國方面的史料已經過相當的研究；又因為彼時中國的外交尚保存相當的自主。若我們切實在中國方面的資料上用一番功夫，定能對學術有所貢獻。甲午以後，中國外交完全喪失了自主權。北京的態度如何往往不關緊要。關緊要的是聖彼得堡、柏林、巴黎、華盛頓及東京間如何妥協或如何牽制。²⁵

這段引文說明蔣廷黻為什麼一方面主張外交史研究必須兼顧各國史料，另一方面卻在看待中國近代史時自我設限於中國方面的史料。主要的學術理由是，其他國家的史料已經得到相當的討論，中國方面的史料卻沒有，而這處空白是可以努力的部分。這樣的觀點呼應蔣氏對馬士的批評。蔣氏挖掘與鑽研長期被忽略、先前並未有系統出版的中國方面之史料，提出一套新的看法，給予晚清處理對外事務的重要官員更客觀的歷史評價。這不能不說是他的社會科學中國化之學術貢獻。然而，馬士的論著是在海外流傳，其影響是國際的。如果蔣氏的研究只在國內流傳，除修正同時代國人的誤解，怎能真正在國際上回應馬士的一隅之見？怎能真正補充馬士對於中國近代外交史的模糊之處？我們可以就此大膽判斷，對馬士的不滿意讓蔣氏的研究產生走向國際化的內在驅動力。

二、作為國際化媒介的《學報》

事實上，蔣廷黻的確努力證明中國方面的史料能夠修正國際上對中國近代（外交）史的誤解。他從1931年開始擔任《學報》的執行編輯，直到1935年底接受南京國民政府的行政院政務處長之任命而正式離開。他是這份英文季刊在20世紀30年代任職最久的執行編輯。同一時期，他大量挖掘各種史料檔案，重新解釋中國近代史。由於執行編輯的職務之便，《學報》成為他向海外推廣以中國方面的史料為基礎的中國近代史研究最方便之渠道。擔任執行編輯期間，特別是赴歐洲考察前3年左右的時間，蔣氏在《學報》上刊登多篇相關史料介紹、論文與短

²⁵ 蔣廷黻，〈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上卷自序〉，《中國近代史研究》，頁13-14。

篇研究心得，藉此探索中國方面的史料如何能提出新的歷史解釋。

1930年前後陸續出版的重要史料，包括故宮的《籌辦夷務始末》、蔣廷黻自己編的《近代中國外交史料輯要》，以及王彥威、王亮合編的《清季外交史料》等。1931年底，《近代史期刊》（*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刊登了蔣氏的〈中國外交的新曙光，1836-49〉（*New Light on Chinese Diplomacy, 1836-49*）。在這篇文章中，他指出《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的重要性在於其收錄的檔案數量遠多於過去已出版的史料例如《東華錄》及《聖訓》，能夠為許多模糊之處提供解釋。他也利用這套新出版的史料說明道光皇帝為何在鴉片戰爭時期在剿夷和撫夷之間搖擺不定。²⁶ 另外，兩套史料都在蔣氏主持的《學報》上得到相當篇幅的介紹。他自己編輯的《近代中國外交史料輯要》由燕京大學的歷史學家洪業撰寫書評，刊載於1932年初的《學報》。²⁷ 同年年中，蔣氏截取〈外交史與外交史料〉與〈「清季外交史料」序〉，構成一篇短文介紹《清季外交史料》。²⁸ 他又以〈外交史與外交史料〉為基礎，在隔年年初的《學報》上比較了故宮的《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清季外交史料》，以及王芸生的《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他在這篇比較書評的最後特別強調，「從這三套史料精心挑選，謹慎地翻譯成西方語言的選集，將是對西方學者一項極好的服務。」²⁹ 對於這些新出版的史料，蔣氏不但向自己的國人介紹，也向海外宣傳。可見得他的確有推動中國近代史研究國際化的意圖。

²⁶ Ting-fu Fuller Tsiang, "New Light on Chinese Diplomacy, 1836-49,"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3:4 (December 1931), pp. 578-591. 該文的前半部日後成為蔣廷黻的另一篇文章，〈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之史料的價值〉，《清華週刊》，第37卷第9、10期（1932年5月7日），頁5-14。

²⁷ William Hung, "Tsiang, *Collection of Essential Sources of Chinese Modern Diplomatic History*," *Review*, 15:4 (January 1932), pp. 620-622.

²⁸ T. F. Tsiang, "Wang, *Sources of Diplomatic History towards the End of the Ts'ing Dynasty*," *Review*, 16:2 (July 1932), pp. 338-340; 蔣廷黻，〈「清季外交史料」序〉，《中國近代史研究》，頁156-157。

²⁹ T. F. Tsiang, "Palace Museum—*Documents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in the Reign of Kwang-siu*, and Wang Yu-sen—*China and Japan during the Last Sixty Years*, and Wang Nien-wei—*Sources of Diplomatic History towards the End of the Ts'ing Dynasty*," *Review*, 16:4 (January 1933), p. 711.

在刊登論文方面，蔣廷黻自己利用《籌辦夷務始末》寫了一篇從同治末年到甲午戰爭之間的中日外交關係。然而，最符合他對外交史著作判斷標準的論文當屬費正清（John K. Fairbank）的〈1858年條約簽訂前鴉片貿易的合法性〉（The Legalization of the Opium Trade before the Treaties of 1858）。³⁰ 費氏說：

我利用中國和英國的文獻資料完成的第一篇研究論文是〈1858年條約簽訂前鴉片貿易的合法性〉。按照這個論題我還在中國社會與政治學會上發表演講。蔣廷黻是該學會刊物《獨立評論》〔按：應為《學報》〕的編委，他於1934年〔按：應為1933年〕7月幫助我發表了這篇文章。……這篇文章的論點是：1858年鴉片輸入為條約所允許，鴉片輸入渠道實際上早就打開，並已接受納稅，因為進口早就不可逆止。³¹

我們或許可以說，費氏的母語是英文，寫英文論文相對容易，蔣氏因而刊登了他的論文。如果輕易接受這樣的觀點，我們很容易抹殺蔣氏背後可能的學術動機。在鴉片合法化的問題上，馬士相信咸豐皇帝是被動的。太平天國和捻匪的問題日益嚴重，「對於政府支出的大量增加，和資源的大量減少，發生了雙重的影響」，「合法化、開禁和徵稅等問題就又引起了討論」，「這位皇帝不得不承認了以下的事實：國務上迫切需要的收入都被放進了私囊，呈解到北京的只是那種照例的正式規費和稅收；但東方人行動是遲緩的，到現在這個問題還停留在討論和考慮的階段。」³² 費氏的文章在蔣氏的幫助下也使用《籌辦夷務始末》裡的材料。³³ 費氏指出，為籌措應付太平天國和捻匪的軍餉，也由於鴉片貿易在東南沿

³⁰ T. F. Tsiang, "Sino-Japa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1870-1894," *Review*, 17:1 (April 1933), pp. 1-106; Fairbank, "The Legalization of the Opium Trade before the Treaties of 1858," *Review*, 17:2 (July 1933), pp. 215-263. 費氏英文論文的中譯名沿用自費正清著，陸惠勤等譯，《費正清對華回憶錄》（上海：知識出版社，1993年）。

³¹ 費正清著，陸惠勤等譯，《費正清對華回憶錄》，頁116。這段譯文有兩處錯誤。第一，費氏的論文事實上發表於《學報》第17卷第2期（1933年7月），並非費氏回憶錄中記載的1934年7月。第二，譯者誤以為回憶錄中的*Review*是《獨立評論》（*Independent Review*）的簡稱，其實費氏是指*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即《學報》。原文參考Fairbank, *Chinabound: A Fifty Year Memoir* (New York and London: Harper & Row, 1982), p. 101。

³² 馬士著，張匯文等譯，《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1卷，頁618-619。

³³ Fairbank, "The Legalization of the Opium Trade before the Treaties of 1858," *Review*, 17:2, p. 222.

海迅速增長，地方官員私下早已開始向鴉片貿易課稅。³⁴ 馬士並不清楚當時東南沿海地方官員對鴉片貿易的處理態度，僅簡略地論述咸豐皇帝的立場。費氏則仔細討論了東南沿海的實際情況。費氏的論文使用中、英兩國的史料，修正馬士的觀點。這正是蔣氏對於外交史研究的要求標準，也是他投身中國近代史的初衷。從學術的角度分析，蔣氏協助費氏刊登這篇文章，是向外國人士說明中國方面的史料能夠相當程度地補充馬士對於中國近代對外關係的一隅之見。

再者，篇幅不長的研究心得是只有在蔣廷黻擔任《學報》執行編輯時才有的文類。前往歐洲考察之前，他以中國方面的史料，特別是《籌辦夷務始末》，寫了6篇短篇研究心得。蔣氏自己似乎並不認為這類的文章十分重要。他的回憶錄有著這麼一段趣聞：

有一次，詹森（Nelson Johnson）公使……託亞那波里斯（Annapolis）海軍學院阿倫（Allen）教授向我徵詢意見，問我鴉片戰爭時艦隊司令克爾奈（Kearny）的行動如何？……問題在克氏是否首倡中國門戶開放。正巧中國當時有一部分資料……對克爾奈於鴉片戰爭時在中國沿海的活動情形透露一線曙光，我的結論是：他並非是門戶開放政策的首倡者。我將備忘錄發表於「中國社會政治科學評論」（《學報》）上，當時我是該刊編輯，此事對我說，到此已經完結了。後來，哥倫比亞大學裴克（Cyrus H. Peake）博士告訴我一件很有趣的下文。有一天，哥大圖書管理員出示給裴克一本上面登著我文章的「中國社會政治科學評論」要他注意上面被別人加的旁註，以及被剪走的部分。館員認為一定是中國學生剪的，要他調查一下究竟是誰幹的。不久後裴克博士獲悉紐約市立圖書館已經抓到那個破壞書刊的人。此人不是別人，正是克爾奈的後人。³⁵

蔣氏的說法和《學報》的記載略有出入。一位克爾奈司令的後人，湯馬士·克爾奈（Thomas Kearney）在1931年7月寫信給當時的美國駐華公使詹森，詢問中國方面有關門戶開放政策的史料。詹森將信轉給蔣氏。兩個月後，湯馬士·克爾奈

³⁴ Fairbank, "The Legalization of the Opium Trade before the Treaties of 1858," pp. 258-263.

³⁵ 蔣廷黻英文口述，謝鍾建譯，《蔣廷黻回憶錄》，頁130。

收到詹森附上蔣氏所寫備忘錄之回信，並得知備忘錄即將刊登於《學報》。³⁶ 這件趣聞並沒有因此結束。蔣氏沒有提到的是，他與湯馬士·克爾奈透過《學報》繼續討論這個議題，在太平洋兩岸共同建構對中國近代史的認識。

首先必須離題指出，蔣氏和湯馬士·克爾奈所談的門戶開放政策，嚴格地說，係指片面最惠國待遇。門戶開放政策僅是美國的政策性宣示，對列強沒有實質約束力。片面最惠國待遇則是明訂在中國的對外條約之中，對中國具有實質約束力。就商業貿易的角度看，片面最惠國待遇的條款讓中國有義務對各國一律平等，雨露均霑。而門戶開放政策的精神可說是反對勢力範圍的劃分及鐵路採礦等利權的獨占。以某種程度來說，我們不能否認兩者之間沒有共通之處。20世紀20年代已有論者主張，華盛頓會議之後，片面最惠國待遇和門戶開放政策有合二為一的發展趨勢。³⁷ 片面最惠國待遇和門戶開放政策可視為一體兩面。湯馬士·克爾奈打算從鴉片戰爭時期訂立片面最惠國待遇，論述他的家族先人對於門戶開放政策的貢獻。

蔣氏的備忘錄以〈南京條約後平等商業利權向英國人以外的民族之延伸〉（*The Extension of Equal Commercial Privileges to Other Nations than the British after the Treaty of Nanking*）為題發表在《學報》上。他利用《籌辦夷務始末》裡的材料說明，平等待遇，即所謂的片面最惠國待遇之實際效果，一向是18世紀以降口行制度的傳統。顧盛（*Caleb Cushing*）簽訂「望廈條約」前，美國人已經得到和其他國家一致的商業權利，差別只在於中、美兩國之間沒有正式的條約。也許克爾奈司令曾提出類似要求，但他的主張沒有任何實質影響。蔣氏特別在最後補充，他的論點是暫時性的，外交史著作必須兼顧各國史料，他自己從中國方面的史料歸納出之論點必須得到其他國家史料的檢驗，才能得出歷史事實。³⁸

³⁶ Thomas Kearny, "Tsiang Documents: Elipoo, Ke-ying, Pottinger and Kearny and the Most Favored Nation and Open Door Policy in China in 1842-1844: An American Viewpoint," *Review*, 16:1 (April 1932), p. 75. 根據湯馬士·克爾奈的這篇回應，《蔣廷黻回憶錄》註明的阿倫教授不是Allen，而是Carroll Storrs Alden。

³⁷ 例如，擁有哈佛大學碩士學位、後來任職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的潘蕃孫便持有類似主張。Van-sung Phen, "Most Favored Nation Clause in China's Treaties," (M.A. thesis, Harvard University, 1923).

³⁸ T. F. Tsiang, "The Extension of Equal Commercial Privileges to Other Nations than the British

這段求教意味濃厚的聲明，促使湯馬士·克爾奈針對蔣氏的論點寫了一篇回應投稿《學報》。他使用他家族先人的私人書信及相關英文史料當證據，試圖為自己家族的先人爭取更高的歷史地位。他認為，在「南京條約」簽訂前，克爾奈司令已經向祁墳、耆英和伊里布提出各國商業權利雨露均霑的要求。他得到祁墳的書面同意，也得到耆英和伊里布的口頭承諾。此舉甚至影響璞鼎查（Sir Henry Pottinger）要求在「南京條約」中加上片面最惠國待遇。克爾奈司令是第一位向中國提出平等待遇的人，對於打開中國的大門有著相當重要的歷史意義。³⁹ 換句話說，湯馬士·克爾奈主張他家族的先人是門戶開放政策的首倡者。蔣氏並不同意這樣的觀點，並在《學報》上提出他的反對意見。由於中國方面沒有任何有關克爾奈司令的官方檔案，克爾奈司令也沒有向美國政府提出正式的報告，蔣氏認為耆英和伊里布的口頭承諾是存疑的。而祁墳的信函模稜兩可，沒有給予克爾奈司令明確的承諾。何況他只是兩廣總督，並非欽差大臣，沒有權力承諾美國在廣州以外的通商口岸的任何要求。璞鼎查僅代表英國爭取片面最惠國待遇，並沒有越俎代庖代表其他國家爭取平等待遇。蔣氏感謝湯馬士·克爾奈提供寶貴的英文史料，使得人們能夠透過中、美兩國的史料廣泛瞭解這段歷史。但湯馬士·克爾奈的說服力仍嫌不足，蔣氏反而更肯定自己原先的暫時性結論：克爾奈司令沒有扮演關鍵角色，中國同意給予片面最惠國待遇，使各國得到平等的商業權利來自口行制度的歷史傳統。⁴⁰ 蔣氏提及的趣聞，事實上是一場以《學報》為平臺的跨國討論。這份英文季刊把蔣氏的論點帶出中國，接受其他國家史料之檢驗，使他的論點不致落於「專聽一面之詞來判訟」之窘境，同時又「綰聯中外人士智識上之關係」。這既符合蔣氏對外交史的要求，也符合《學報》的創刊宗旨。

從書評、費氏的論文，到短篇研究心得，蔣氏在擔任《學報》執行編輯期間，積極地把用新史料重新解釋的中國近代史往海外推廣。類似的工作，蔣氏同時也透過國內的各種中文期刊進行。換句話說，蔣氏的對話對象包括國人和外國人士。他不滿意馬士「片面的」歷史論述，堅信外交史著作必須兼顧各國史料。當他挖掘中國方面的史料從而探討中國近代史之時，他不能漠視其他國家的史

after the Treaty of Nanking,” *Review*, 15:3 (October 1931), pp. 422-444.

³⁹ Thomas Kearny, “Tsiang Documents,” *Review*, 16:1, pp. 75-104.

⁴⁰ T. F. Tsiang, “A Note in Reply,” *Review*, 16:1, pp. 105-109.

料，有必要和其他國家的人士進行對話。因此，蔣氏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存在自內而外的國際化驅動力，而《學報》則是他達成此一目標的媒介。他刊登新出版史料之介紹書評，協助費氏第一次發表使用中、英兩國材料的論文，自己也發表研究心得與外國人士對話。擔任執行編輯的蔣氏欲利用這份英文季刊向國際證明，中國方面的史料能夠修正、補充馬士的一隅之見。在此同時，他也讓以中國方面的史料為基礎的中國近代史研究接受其他國家史料之挑戰。換句話說，《學報》是避免他重蹈馬士的覆轍之工具。中國近代史，對蔣氏來說，不獨屬於中國。該領域由各國史料共同建構，既要中國化，也必須國際化。

肆、蕭公權與尋找文化自信的中國政治思想史

蕭公權自學成歸國後，便開始教學與研究並重的學術生涯。先後在南開、東北，以及燕京等校任教。1932年，他被清華延攬加入該校政治系。⁴¹ 這段期間，蕭氏發表了〈拉斯基政治思想之背景〉及〈中國政治思想中之政原論〉等篇論文。⁴² 我們不能說蕭氏不積極分享自己的研究，但他對於《學報》似乎缺乏像對其它中文刊物那般的寫稿熱忱，也沒有積極參與中國社會及政治學會的活動。他只在蔣氏擔任執行編輯的期間投稿3篇書評。⁴³ 簡言之，蕭氏並非《學報》及其發行單位的核心人物。

⁴¹ 蕭公權，《問學諫往錄》，頁89-100。

⁴² 〈拉斯基政治思想之背景〉原發表於《清華學報》，第7卷第2期（1932年6月），收入蕭公權，《迹園文錄》（蕭公權全集之九）（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年），頁3-20；〈中國政治思想中之政原論〉原發表於《清華學報》，第9卷第3期（1934年7月），收入蕭公權，《迹園文錄》，頁21-35。

⁴³ K. C. Hsiao, "Tseng Yu-hao, *Modern Chinese Leg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Review*, 15:3 (October 1931), pp. 445-447; "Gale, *Huan K'uan: Discourses on Salt and Iron*," *Review*, 15:4 (January 1932), pp. 608-614; "Hsu,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Confucianism*," *Review*, 16:1 (April 1932), pp. 115-118. 這3篇書評似乎都沒有收進《迹園文錄》或《迹園文存》（臺北：寰宇出版社，1970年）。

一、從圈外人到被動消極的執行編輯

蕭公權能夠成為《學報》的執行編輯是由於蔣廷黻的委託。他說，「民國二十三年廷黻休假，到歐洲各國去研究考察。他把編輯『中國社會及政治學評論』（《學報》）……的任務交給我代理。……二十四年八月廷黻回校。我把已經編好下年首期的稿件交給他，才卸下我的責任。」⁴⁴ 1年之後，蔣氏接受南京國民政府的徵召而離開，蕭氏再次從他手中接下這個位子直到抗戰爆發前夕（見表1）。蕭氏前後一共為這份英文季刊服務2年。他回憶：

我謹慎從事，把全年四期，按時印行了，雖然約稿、閱稿、校對等事佔了我不少的時間。其中最難的工作是閱稿。……編輯工作……的最重要項目之一是為作者改正稿中的「筆誤」。這是勞心費時而不一定討好的工作。編者當然無權任意修改來稿。比較重要的錯誤或疑點，必須與作者商定後才可著手訂正。但編者也不可藉口「文責由作者自負」，把稿中錯誤的字句，照樣刊出。⁴⁵

蕭氏的自述說明他對這份編輯工作的專業認知並且投入大量的心血，力求時效與品質的兼顧。不能不承認他是一位負責任、細心的執行編輯。

蕭公權和《學報》或其發行單位（中國社會及政治學會）原本沒有很深厚的淵源。他可說是這份英文季刊的圈外人。為什麼蔣廷黻特別請他接任執行編輯？蕭氏高深的英文造詣固然是他能否勝任的重要考量，而蔣、蕭兩人之間的友誼也是影響蔣氏決定的另一個關鍵。在20世紀30年代，中國社會及政治學會的成員泰半是華北的中外知識菁英，包括擁有哥倫比亞大學學位的袁同禮、曾在哈佛大學講學的歷史學家洪業，以及協和醫學院的顧臨（Roger S. Greene）等。如果我們主張蕭氏的英文造詣是他接任《學報》執行編輯的主要原因，這等於是間接否定參加中國社會及政治學會的其他知識菁英之英文造詣。這似乎不是一個公允的論斷。我們或許可以從社會科學中國化的角度詮釋這樣特殊的決定。蔣氏說：

提倡研究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歷史等等，……並不是要中國人以

⁴⁴ 蕭公權，《問學諫往錄》，頁103-104。

⁴⁵ 蕭公權，《問學諫往錄》，頁103-104。

後不研究西洋的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和史學。我以為不通西洋政治〔學〕的人絕對不能對中國的政治思想或制度的研究有所貢獻。其他社會科學亦然。我們必須中西兼顧，然後能得最大的成功。⁴⁶

蕭氏在美國求學時主修西洋政治思想史。他的博士論文〈政治多元論〉（Political Pluralism: A Study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eory）出版後備受肯定。⁴⁷ 他是這片領域裡學識極為淵博的專家。返國後，他改弦易轍，致力於中國政治思想史的體系建構。以上面蔣氏引文之標準看，蕭氏是最能夠在政治學乃至社會科學中國化的道路上有所發揮的人之一。蔣氏擔任《學報》執行編輯期間積極向海外推廣以中國方面的史料為基礎的中國近代史研究，離開時又找中國政治思想史的拓荒者接替他的職務。《學報》是蔣氏推動中國近代史研究中國化與國際化的媒介。當蔣氏選擇他自己認同的社會科學中國化的另一位推動者蕭氏接替自己的位置，其目的或許是希望這份英文季刊能夠繼續推動中國化的社會科學走向國際。中間的學術意義不可謂不深遠。

然而，蕭公權對於《學報》的貢獻，如同他的自述，僅限於約稿、閱稿及校對等保守的編輯工作。在他擔任執行編輯期間，聊勝於無地為這份英文季刊撰寫2篇書評。1篇批評何沙維（Sverre Holth）有關墨子的著作，是擷取〈評沈仲壽著「易掛與科學」、「華英易經」何沙維著「墨子」〉的一部分改寫而成。⁴⁸ 另一篇則討論威廉生（H. R. Williamson）的王安石研究，也有相似度頗高的中文書評。⁴⁹ 與蔣氏比較起來，蕭氏沒有效法蔣氏，積極主導《學報》的走向，向國

⁴⁶ 蔣廷黻，〈中國社會科學的前途〉，《蔣廷黻選集》，第1集，頁158。《蔣廷黻選集》刪去《獨立評論》原文中的「學」字。《獨立評論》，第29號，頁11。

⁴⁷ 例如，《政治多元論》被牛津大學列入「近代名著」（Modern Greats）。該書的成就為汪榮祖和黃俊傑津津樂道。例如汪榮祖、黃俊傑編，《蕭公權學記》，頁20-12、42-42。

⁴⁸ Kung-chuan Hsiao, "Sverre Holth—*Micius: A Brief Outline of His Life and Ideas*," *Review*, 20:1 (April 1936), pp. 157-159; 〈評沈仲壽著「易掛與科學」、「華英易經」何沙維著「墨子」〉原發表於《清華學報》，第11卷第3期（1936年7月），收入蕭公權，《迹園文錄》，頁335-335。《迹園文錄》誤植為第8卷第1期。

⁴⁹ K. C. Hsiao, "H. R. Williamson—*Wang An Shih: A Chinese Statesman and Educationalist of the Sung Dynasty*," *Review*, 20:3 (October 1936), pp. 444-446; 〈評威廉生著「王安石」〉原發表於《社會科學》，第2卷第1期（1936年10月），收入蕭公權，《迹園文錄》，頁377-380。

際推廣中國政治思想史或任何其他中國化的社會科學之領域。在他擔任執行編輯期間，《學報》沒有明確的主題，比較像一份綜合性的英文學術季刊。蕭氏做為一位繼任者，他對於《學報》的工具性價值明顯保守消極許多。

二、文化自信與中國政治思想史

我們可以從蕭公權早年投身中國政治思想史的動機探究他為什麼對於蔣氏走出去的做法並不十分熱衷。蕭氏學生之一的汪榮祖轉述蕭氏本人的說法：

蕭先生要建構一部中國政治思想史，不能只是匯集相關中文資料，編寫成書，而且要建立學門。蕭著並不是第一本中國政治思想通史，之前已有《中國政治思想史》為書名的著作，……但都未能扣緊「政治思想史」此一學門的規範，流於泛論無歸，尤其是陶〔按：陶希聖〕著，將社會史以及其他思想史資料匯雜在一起，不能聚焦於政治思想，乃蕭先生立志要重起爐灶的一個主要的原因。⁵⁰

這樣的動機是十分學術的。自梁啟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之後，不少中國思想史的相關中文著作陸續問世。蕭氏認為那些著作都流於俗套，不夠嚴謹，對於中國政治思想史的脈絡無法提供深入的解釋，遑論對領域建構發揮推波助瀾的影響力。蕭氏獻身此領域是為了超越那些著作，為國人寫一本提供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系統性解釋。換句話說，他早年的主要對話對象是自己的同胞。

這個學術動機的背後還有一層更深刻的終極關懷，促使蕭氏在20世紀30年代為國人開墾中國政治思想史這片新領域。他說：

「全盤西化」的主張者對於中西文化未能充分了解。他們的主張是錯誤的。我相信中國文化和西洋文化都有優點和缺點。我們要用虛心的批評態度同時去檢討中西文化。囫圇吞棗式的中國文化論……我們不能接受。……中國文化當中固然有不合時，不合理的成分，但也有若干觀念仍然有現代的意義。例如，「民惟邦本」，「天視自我民視」……在今

⁵⁰ 汪榮祖，〈蕭公權與中國政治思想史的建構〉，收入汪榮祖、黃俊傑編，《蕭公權學記》，頁21-22。

日任何「文明的社會」裡都可以適用。根據這認識，我立了一個志願：我今後要用留美所受的一點訓練，所得的一點知識，去從長研究中國文化。我在美國曾研究西洋政治思想。我回國後的主要工作當是中國政治思想的研究。⁵¹

蕭氏的想法和蔣氏的〈中國社會科學的前途〉頗為接近。前者認為中國政治、社會、經濟和歷史等領域值得鑽研，也應該鑽研。後者立志「從長研究中國文化」，以行動呼應這樣的主張。蕭氏為國人開拓中國政治思想史這一新領域，其目的是駁斥「全盤西化」之主張。⁵² 若他的研究能指出中國也有符合現代意義的政治思想，等於證明中國文化在現代社會裡並沒有失去價值，從而駁斥「全盤西化」的主張。換句話說，中國政治思想史是蕭氏找尋文化自信之依託，為國人也為他自己重新肯定中國文化是他開墾這片新領域的終極關懷。

蕭公權立志以「留美所受的一點訓練」，建構中國政治思想史嚴謹的系統性解釋。歸根究柢，建構這項領域之學術工作的背後動機既是文化的，也是內向的。站在反對「全盤西化」的立場，蕭氏企圖證明中國政治思想不但可與西方政治思想相提並論，而且也有能適用於現代社會的部分。一方面回應張奚若「中國沒有值得研究的政治思想」的嘲諷，與蔣廷黻的〈中國社會科學的前途〉之主張互相呼應。另一方面，在20世紀30年代，蕭氏中國政治思想史之對話對象是自己的同胞，重尋對中國文化的自信是其終極關懷。他缺乏如蔣氏那般走向國際化的內在驅動力，沒有利用《學報》向國外推廣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積極動機。

《學報》欲以科學重新評估中國過去及現在的政社經驗，並「綰聯中外人士智識上之關係」。兩者在文化立場和對話對象有不同的取向。或許我們可以說，這樣的差異使得蕭氏沒有將這份英文季刊當作一種工具，在擔任執行編輯時趨於被動消極，嚴守保守的編輯工作本分。

⁵¹ 蕭公權，《問學諒往錄》，頁70。

⁵² 有關「全盤西化」主張之起源與發展，趙立彬，《民族立場與現代追求：20世紀20-40年代的全盤西化思潮》（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

伍、餘論

在抗戰爆發前夕，蔣廷黻與蕭公權在各自的領域裡戮力為中國的社會科學做出貢獻。大方向一致，但學術動機和對話對象之差異，使得他們中國化的取向存在著不易被察覺的分歧。1931-1937年間，兩人輪流擔任執行編輯的《學報》恰如其分地凸顯了這樣的分歧。蔣氏認為外交史應注重各國史料，欲以中國方面的史料回應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的單方面論述。他的學術動機促使他向海外推廣中國方面的史料為基礎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他在《學報》刊登新出版史料的書介，撰寫短篇研究心得，並協助費正清第一次發表以中、英兩國史料為基礎的論文。蔣氏的積極作為頗符合這份英文季刊背後的學會之成立宗旨——「縮聯中外人士智識上之關係」。相反的，蕭氏早年投身中國政治思想史是為了建立文化自信，對抗「全盤西化」之主張，外國人士不是主要的對話對象。在移居美國之前，他的研究缺乏類似蔣氏的內在驅動力促使他積極向國外建立學術對話。前後任執行編輯的研究取向不同，造成對待《學報》的態度有著明顯的反差，出現蔣、蕭不同調的情況。透過比較蔣、蕭兩人對這份編輯工作的態度，我們得以跳脫過去的討論框架，重新思考兩人的學術成就。

當代的蔣廷黻研究側重張騫（從政）與司馬遷（治學）兩個比喻之間的關聯性，試圖解釋他的學術和政治生涯之轉換，卻長期忽略他於推動中國近代史研究國際化之努力。在有限的學術生涯中，蔣氏確實取得一定的成績，我們應給予相當的肯定。另一方面，蕭氏在中國政治思想史領域的重要性無需贅言，至今仍然沒有一本通論性的中國政治思想史著作能夠超越蕭氏的《中國政治思想史》。當代的蕭公權研究把焦點擺在這本經典著作，探討其方法論與學術價值，為這本經典著作在中國學術思想史裡安排一個恰當的位置。被忽略的是，蕭氏帶有民族感情的學術動機使他在20世紀30年代於中國政治思想領域裡並不注重和外國人士的學術交流。

我們不必據此論斷蔣、蕭兩人孰優孰劣。更重要的是，他們不同取向的社會科學中國化帶給我們什麼樣歷史經驗的啟發？從一個宏觀的角度看，蔣、蕭兩人身處西學東漸的另一階段之開端。在清朝的最後20年，西學被大量譯介，透過新

式學堂、報刊及學會等媒介，迅速卻不均勻地在知識階層之間流傳，中國進入一個思想的轉型時代。⁵³ 傳統的學術思想受到激烈的衝擊，被譯介的西學逐漸成為知識階層議論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及歷史等現象的思想資源。當中國仿照西方學制設立分科大學，社會科學的各領域逐漸進入專業化與制度化的階段。隨著分科大學增加，不走科舉轉而留洋的學子一批又一批返國進入大學任教，社會科學的專業化和制度化逐漸擴散至各地。這個趨勢到抗戰爆發前達到頂點，蔣、蕭兩人正處在這個學術發展最蓬勃的時期。他們對中國近代史和中國政治思想史的努力，意味著有關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及歷史等領域的知識產出也開始進入以西方社會科學為標準的專業化和制度化。各抒己見的議論無法建立對中國的系統性認識，也不足以對中國面臨的問題提供解釋。這股需求促使學術圈在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及歷史等領域生產符合西方社會科學標準的系統性知識。蔣氏的中國近代史和蕭氏的中國政治思想史是這個新階段的成就，可以說他們兩個代表這個階段之開端。

然而，蔣、蕭兩人身處的時代，社會科學哲學和方法論的討論尚未成熟，無法從知識論和方法論的角度檢討什麼是社會科學中國化。和他們同時代的學人認為中國不該模仿西方的社會科學理論，必須追求能為中國的問題提供解釋的中國社會科學。直到20世紀80年代，一群中央研究院的社會科學家開始從知識論和方法論反思什麼是社會科學中國化。⁵⁴ 他們問，社會科學的知識標準背後有沒有西方文化的價值預設？會不會影響非西方研究者的問題意識？如何在研究時呈現文化差異？換句話說，這是對蔣、蕭那一輩學人的社會科學中國化進行一次再檢討。隨著兩岸政治關係的變化，他們開始重視兩岸在政治、經濟及社會等領域的差異，思考中國化、臺灣化、在地化與本土化等概念範疇的區別。⁵⁵ 這些社會科學家的討論引起華人學術圈的普遍重視，為今日的倡導者提供相當豐富的理論基礎。單就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歷史領域來說，社會科學中國化在今天已經

⁵³ 張瀨，〈轉型時代在中國近代思想史與文化史上的重要性〉，收入張瀨，《張瀨自選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109-125。

⁵⁴ 楊國樞、文崇一主編，《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的中國化》（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2年）。

⁵⁵ 蕭全政，〈社會科學本土化的意義與理論基礎〉，《政治科學論叢》，第13期（2000年12月），頁1-26。

是一種共識。不經反省直接套用歐美的社會科學理論依樣畫葫蘆，無法解釋中國複雜的政治、經濟、社會、歷史領域，也喪失在地學術社群的主體性。我們必須建構符合中國特殊時空脈絡的系統性知識以解釋中國的現象，避免成為西方學術界的延伸，追求自身的學術主體性。但在多大程度上，社會科學的中國化既可兼顧解釋效力與主體性，又不落入閉門造車、學術義和團的責難？20世紀30年代的社會科學中國化，如蔣、蕭兩人所示，僅以西方社會科學的標準，研究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歷史等現象。他們的歷史經驗恐怕很難幫助我們回答這個有關知識論和方法論的大哉問。然而，他們兩人的歷史經驗卻能為我們指出，社會科學中國化亦是有關學術動機和對話對象之取捨。建構中國化的系統性知識是為了與外國人士共同討論中國？加深國人對自己國家的認識？還是兩者皆是？這個問題恐怕沒有標準答案。蔣、蕭兩人立下的榜樣，當可為今日投身社會科學中國化的學人於思考學術動機和對話對象取捨的問題上提供參考。

徵引書目

一、文集、回憶錄、訪談錄

芮恩施（Paul S. Reinsch）著，李抱宏、盛震溯譯，《一個美國外交官使華記：1913-1919美國駐華公使回憶錄》（*An American Diplomat in China*）。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

費正清（John K. Fairbank）著，陸惠勤等譯，《費正清對華回憶錄》（*Chinabound: A Fifty Year Memoir*）。上海：知識出版社，1993年。

蔣廷黻，《蔣廷黻選集》。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年。

蔣廷黻英文口述，謝鍾璉譯，《蔣廷黻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4年再版。

蕭公權，《問學諫往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2年。

蕭公權，《迹園文存》。臺北：寰宇出版社，1970年。

蕭公權，《迹園文錄》（蕭公權全集之九）。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年。

Fairbank, John K. *Chinabound: A Fifty Year Memoir*. New York and London: Harper & Row, 1982.

二、期刊、報紙

《政治學報年刊》，北京，1916年。

《獨立評論》，北平，1932-1937年。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Peking/Peiping, 1916-1941.

三、專書

王汎森等，《中華民國發展史——學術發展》，上、下冊。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1年。

汪榮祖、黃俊傑編，《蕭公權學記》。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9年。

- 桑兵、趙立彬主編，《轉型中的近代中國——近代中國的知識與制度轉型學術研討會論文選》，上、下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
- 馬士（H. B. Morse）著，張匯文等譯，《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全3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年。
- 張允起，《憲政、理性與歷史：蕭公權的學術與思想》。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
- 張灝，《張灝自選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
- 郭穎頤（Danny W. Y. Kwok）著，雷頤譯，《中國現代思想中的唯科學主義（1900-1950）》（*Scientism in Chinese Thought, 1900-1950*）。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
- 楊國樞、文崇一主編，《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的中國化》。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2年。
- 蔣廷黻，《中國近代史研究》。臺北：里仁書局，1982年。
- 趙立彬，《民族立場與現代追求：20世紀20-40年代的全盤西化思潮》。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
- Lin, Xiaoqing Diana. *Peking University: Chinese Scholarship and Intellectuals, 1898-1937*.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5.
- Weston, Timothy. *The Power of Position: Beijing University, Intellectuals, and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1898-192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四、期刊論文

- 沈渭濱，〈蔣廷黻與中國近代史研究〉，《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第4期（1999年）。
- 林文仁，〈介於兩個世界之間——蔣廷黻和他的中國外交史研究〉，《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第31期（1999年6月）。
- 林志宏，〈蔣廷黻、羅家倫、郭廷以：建立「科學的中國近代史」及其詮釋〉，《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雜誌》，第42卷第4期（2004年12月）。
- 歐陽軍喜，〈蔣廷黻與中國近代史研究二題〉，《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期（2001年）。
- 蔣廷黻，〈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之史料的價值〉，《清華週刊》，第37卷第9、10期（1932年5月7日）。

蕭全政，〈社會科學本土化的意義與理論基礎〉，《政治科學論叢》，第13期（2000年12月）。

Tsiang, Ting-fu Fuller (蔣廷黻). "New Light on Chinese Diplomacy, 1836-49."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3:4 (December 1931).

五、年鑑、辭典

Ch'en, C. D. Henry ed., *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Index to Volumes I-XXIV, April, 1916-March, 1941* (又名《中國社會及政治學報第一至第二十四卷總引得》). Hong Kong: Lung Men Bookstore, 1967.

六、未出版學位論文

Phen, Van-sung, "Most Favored Nation Clause in China's Treaties." M.A. thesis, Harvard University, 1923.